

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：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》讀記

梁右典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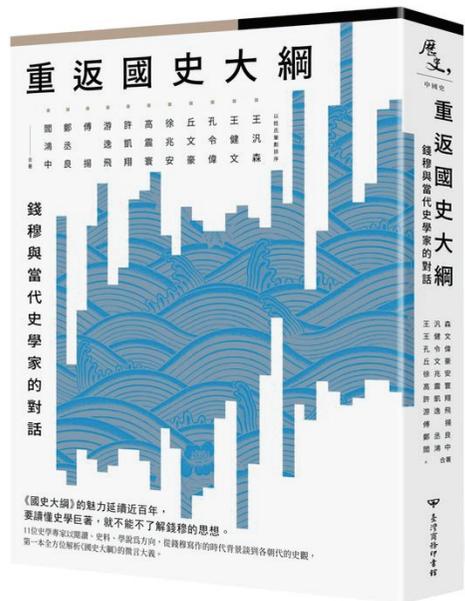
書名：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：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》

作者：王汎森、王健文、孔令偉、
丘文豪、徐兆安、高震寰、
許凱翔、游逸飛、傅揚、
鄭丞良、閻鴻中
(以姓氏筆劃排序)

出版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23年7月初版

ISBN：9789570535068



錢穆（1895-1990）《國史大綱》是近代最著名的通史著作之一，從上世紀四〇年代即受到學界密切關注，至今也仍不斷發揮它的影響力。然而，對於現代讀者而言，它的不易閱讀也是許多人的共同感受，因此有必要再對其進行意義梳理，才能彰顯該書於現今學術史的地位與意義，以及如何把握它的核心精神所在。臺灣商務印書館於二〇二二年企劃一系列《國史大綱》的系列講座，理由很簡單，正是「《國史大綱》一直長踞臺灣商務暢銷書排行榜前三名」（出版緣起，頁8）；而且「實體講座要有相互搭配的成果出版，不能在演講結束後，隻字片語也隨之煙消雲散」（企劃序，頁10），因而有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：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》之專書問世。然而，當代出版《國史大綱》還有更深層的原因，在於透過《國史大綱》可以瞭解錢穆的思想世界，以及《國史大綱》所反映的歷史世界。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兩者是交融互織，需要透過細心解

* 黃岡師範學院傳媒與影視學院特聘副教授。

讀以逐漸彰顯民國初期的學術思潮與通史觀點，不斷豐富該書的多層內涵，以致於幫助讀者對於近九十年前的書籍能有身歷其境的認識與體會。不用說，《國史大綱》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不易一語道破，所以本書匯集當代史學觀點，講者群分別從「歷史書寫、閱讀視角、學術精神、士人概念、域外觀點、宗教關懷、朝代史觀等論點著手，帶領讀者一步步打開《國史大綱》」（封底語，頁 10）。

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的意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的說法，但是嚴格遵守對於原始史料的詳細解讀，並且密切注意學界對於各項議題的現代研究，而能提出一己之見。因此，他不同於書中劃分的傳統派（記誦派）、革新派（宣傳派）與科學派（考訂派），而是對以上派別皆有所反省、截長補短；書中所追求的目標，若以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言，即是以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做為史家最高境界的追求。至今，我們面對錢穆《國史大綱》仍可從司馬遷對於史家的自我要求作出觀照，亦不難發現書中就「究天人之際」並非哲學概念的闡發，而在於歷史演變的考察；在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》裡，閻鴻中提到「中國宗教特質的演變」一小段落（頁 126-127）、許凱翔論述「立基於社會治理——《國史大綱》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」（頁 334-351）等等都是實例，「究天人之際」的層次，整體上並沒有在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》佔據絕大篇幅。這正是因為錢穆的「究天人之際」並不是《國史大綱》內的核心精神，雖然書中所言並沒有與此衝突；也就是說，錢穆把更多的書寫內容與精神放在「通古今之變」，至於能不能「成一家之言」，他相信成立的標準必須經由現代學術檢驗，但也希望能夠發揮歷史作用，激發時人對於本國歷史之信心，從中獲取無盡藏的精神資源，該書充滿明顯的國族意識。就此意義來說，《國史大綱》就在國族需求與時代意義上逐漸建立起它的「一家之言」，而與我們當代強調的學術意義或有些許不同之處。

再就「究天人之際」於歷史書寫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稍作論述，因

爲這在《國史大綱》佔有一定地位，於司馬遷所論亦居首位，並對於史學經典的成立有所省思，最值得留意之處，即是探討當中「人」的能動性爲何。余英時〈國史大綱發微——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〉提到：「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，『天』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，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，『人』則指人的主觀力量，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」。¹人的主觀力量、人的能動性、人的創造作用都不是機械的、重複的，而是有機的、生發的存在，因此歷史發展必然有不斷創造新的可能，反映在種種社會制度與文化脈絡。因此，「究天人之際」成爲論述的基礎，亦由此可形成系統之觀點，並指導以下「通古今之變」的歷史，從中勾勒國史之扼要關節。由此出發，觀察國史變遷動態之過程，提出自己看法，形成系統性的觀點。不用說，錢穆作爲一名傑出史學家的精義，亦建立在他對於一手史料與現代學術的通盤考察與精準掌握，至今仍不斷發揮它的影響力。

杜正勝也曾就《國史大綱》的學術意義與時代意義進行評價，即不以現今學術成果批評《國史大綱》爲何不足、不以別人研究重點評價爲何不及，而是有其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的整體脈絡與系統觀點。²此點觀察值得我們現今閱讀《國史大綱》之際，特別需要注意之處；更何況《國史大綱》內部仍有其議題值得繼續開展，這是在閱讀理解錢穆書中原意的基礎上，可以再進一步思考的議題。可以再就以下各點進行說明：

第一，是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深化，基本上是依照錢穆開出的研究方向持續前進：例如錢穆高弟嚴耕望一再閱讀《國史大綱》，經許多年後再次閱讀，仍是表示佩服之意，許多制度史研究也是深受錢穆影響；孫國棟〈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〉對於三省制的發展能夠敘述得更爲清楚，

¹ 余英時：〈國史大綱發微——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二十九期（2016年12月），頁4。

² 杜正勝：〈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〉，《新史學之路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4年），頁229。

換句話說都可看到錢穆的影響力，仍在史學界發揮作用，而且所啓發而成就的學術成果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眾所周知，余英時曾表示他的中國史研究若沒有錢穆的指引，不能有現在的發展等謙詞。第二，在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的研究基礎上，指出值得開拓的新領域，雖然錢穆講得較少，但已可見端倪，為後來學者開啓無數方便法門。例如本書作者之一，孔令偉〈情的融合？——《國史大綱》與域外思想〉，即針對域外思想、非漢族思想狀態而發；上文剛剛涉及許凱翔〈立基於社會治理——《國史大綱》中古至中古的宗教〉，則是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觀念與經驗，所具有的非理性或「不可化約性」的特質，觀察錢穆如何彰顯宗教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角色與地位；而這又涉及錢穆對於宗教的認識，透過此認識也可連帶反省現代學術對中國宗教的定義問題。第三，《國史大綱》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，主要可就學術思潮當成觀察重心，以及從通史精神做為觀察路徑，而歸於「士」之自覺成為歷史推進的主要動力之一。例如：徐兆安〈士之自覺——能動性問題與現代中國思想史中的《國史大綱》〉提到「能動性（agency）與被動的分際，樂觀與悲觀的張力，長時段的結構解釋跟短時段的人物事件的解釋」（頁 215）。思潮方面的敘述則見於王汎森〈歷史時間是延續的嗎？錢穆與民國學術〉，勾勒一九三〇年代的三種歷史觀——左派史學、歷史考證學派、傳統的文史記授之學，認為錢穆有意區別「文化的」或「文明的」思想觀點，也凸出錢穆所謂「心學與史學」的配合研究；雖然在現今強調客觀研究來說，錢穆的史學觀點屬於較為特殊的看法主張，也由此讓我們重新思考：錢穆《國史大綱》所呈現的中國歷史本質究竟為何的大哉問。

書中收錄王健文〈需要一種新的國史——錢穆與《國史大綱》〉則提供我們一種新的國史思考；一般而言，提到「國史」總會捲入無窮無盡的意識型態之爭，但在錢穆的思想世界，以及依據史料所呈現的歷史世界，自然也想告訴讀者對於中國歷史觀點的建立是如何形成。然而，完全追求客觀而不考慮史家在當中的主觀成份，在過去史學界已進行許多

討論；總而言之，史學家要在明白認知自己的主觀想法的前提下，抱持嚴謹治學態度依據傳世或出土文獻，努力建立相對客觀的歷史世界。從王健文對《國史大綱》的觀察來看，他認為「從學術影響到政治，回頭再走上一條合理的路，打造出一個合理的政府。這是錢穆一以貫之的觀點」（頁 76）。因此，學術的重要性、合理的必要性，都是錢穆論述中國歷史發展過程很重要的因素；但也的確要留意是否「走在主觀客觀交接的斷崖邊，也很難避免因目的使手段正當化的危險」（頁 80）。作者也適度徵引同一時期或稍晚時候的《國史大綱》，如果從總體性、通論性著作來說，沒有人能夠超越《國史大綱》；不論表現在對於問題認識的深刻、論述框架的嚴謹、以及歷史發展的整體詮釋。不斷與所處時代風氣與最新學術成果進行對話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繼往開來，結合當時的「國族」與「民族」論述，希望透過歷史來瞭解國家與民族。如同錢穆研究歷史的夫子自道：「從九一八事變後開始的，探究國家民族還有沒有希望」（頁 60）。也就是說，必須由歷史來認識來接引時代精神，歷史或稱為國史即屬於一種精神、心理與意志的思想資源。

綜合觀察書中十一位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《國史大綱》的主旨、以及一切可供開展之議題。大致來說也可歸於錢穆所說「一個制度的推行，必有與其相副的一種精神與意識，否則此制度即毀滅不能存在」。³一般來說，學界或重中國制度史或重中國精神史，偏此重彼是常見現象，但是透過《國史大綱》的內容確是可讓我們感受兩者結合不但可能，而且也能達到很高的水準，並對後來學界研究方向有所啟發。我認為本書十一位作者提出的各種建議，亦大抵是探討《國史大綱》在這兩方面的側重，雖然比率或有不同，但皆留意兩者之間如何達到有效結合，凸顯錢穆治史成果之所以與其他史家的不同之處。書中許多學者也都注意到錢穆史學在當時不能說為大多數人接受，但不可諱言的是錢穆《國

³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【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】》上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23 年 3 月），頁 521。

史大綱》問世後，已然開啓一番中國史研究的新氣象，至今八十餘年仍是歷久不衰。所以，當我們閱讀中國史之際，需要梳理作者在當中所寄託的各種心史與學術史，並彰顯歷史過程中之「變之所在，即歷史精神之所在，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」（頁 109）之意義。即使從學術意義上的客觀角度，縱使對中國文化沒有特別情感者，那麼《國史大綱》仍對現今學界有參考價值嗎？高震寰〈從文獻中抽繹時代精神——《國史大綱》的上古史〉一文對此抱持肯定態度，特別將其視為「作為一部有深厚文獻根底的作品」、「今後仍能刺激出許多精彩的研究」（頁 299）。

而且，在文獻徵引方面，錢穆也不是侷限於傳統二十四史或常見古籍；余英時指出「《國史大綱》中的原始史料包羅萬象，並且經過了『整輯排比』、『參互搜討』等系統性的處理，以密切配合全書『三層結構』的構想」。⁴游逸飛〈如何閱讀《國史大綱》——經典·學說·史料〉提到《國史大綱》徵引史料可稱得上是「森羅萬象的傳世文獻」（頁 162），甚至認為「《國史大綱》引用文獻考」值得進一步研究（頁 167）。此外，扣求歷史為尋找發展中更具合理性的因子，即使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，仍可透過史實加以省思；傅揚〈大時代的氣運盛衰——《國史大綱》的中古史〉指出「錢穆念茲在茲的，可以說是一種立國的精神，也就是國家、政權或集體人群要建立集體秩序，需要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」（頁 306）；觀察錢穆中古史的歷史敘述與部分觀照，終將回歸一種「更合理的政治意識」。⁵即使隋朝經濟較為出色，但必須留意仍有不足之處；錢穆並非以物質富裕作為朝代發展的主要判斷標準，而是制度背後的政治意識、精神與理念。

因此，《國史大綱》對於政治意識、精神與理念的把握，使得本書亦

⁴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【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】》上冊，頁 9。另外，「三層結構」的構想，即所謂「拙著側重上面政治，更重制度方面，下面社會更重經濟方面。中國注重士人參政，於歷代選舉考試制度及時代士風，頗亦注意」。見於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【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】》上冊，頁 19。

⁵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【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】》上冊，頁 477。

具有鮮明的政治史寫作意識；如鄭丞良〈以政治為走向的書寫——《國史大綱》的宋元史〉即就此而發，認為「錢穆非常注重政治制度背後蘊涵的理性精神」（頁 386）。而且，就歷史整體與分段來說，也可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貌；如丘文豪〈專制下的經濟與學術——《國史大綱》的明清史〉就曾提到錢穆對於中國歷史是否專制的看法，基本上認為是「士人政治」；另一方面，「但若是只看明清史的部分，錢穆同意中國是專制的」（頁 399）。一般來說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仍有很大影響：即認為錢穆是文化保守的代表，對於中國歷史只說好話不說壞話；但是閱讀《國史大綱》，以及參考本書十一位作者的闡發，不難發現錢穆的觀點乃是建立在一手嚴謹的史料基礎，以及五四以後的二十年間，中國內外一切可供參考的研究成果，皆在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的「整輯排比」與「參互搜討」中保存下來，如今更透過《重返《國史大綱》：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》一書得以明白呈現。也因為如此，余英時即注意到閱讀錢穆《國史大綱》背後有其學術史意涵，僅是受限於教科書體例，無法完全展開；徐兆安則提醒應該要參考其他斷代史家的專論，⁶相互比較之下顯得更為清楚（頁 192）。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的背景形成，王汎森形容那是「在傳統史學的廢墟中的重構行動」（頁 47），自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而更有意識研究中國歷史，探究國家民族是否還有希望，基本上處於一種深刻的意義危機之中。但他卻在國史中發現意義價值的源流，即在學術中找到知識人提供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因素，由學術思想影響政治運作，逐漸形成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的配合，走在理性發展的人文中國，勾勒「時人對此制度所與的精神以及意識上之轉變」。⁷這是《國史大綱》帶給我們一幅幅歷史生動的精神與意識面貌。

⁶ 例如陳寅恪：〈李唐氏族之推測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卷第一期（1931年8月），頁 39-48。

⁷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【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】》上冊，頁 521。